

关于南社

南社，1909年11月13日创建于苏州，发起人是陈去病、高天梅和柳亚子三人。南社成员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知识分子最集中、成员社会职业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以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主国家、并力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西方进步文化、促进社会革新为主要宗旨的民间组织。上个世纪初，继晚清同光体诗派之后，受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思想影响，陈去病、高天梅和柳亚子等人于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发起组建了一个革命文学团体。该组织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广纳知识界革命激进分子，以“藉诗文号召天下，鼓吹革命”为旗帜，取“操南音不忘旧”之义而得其名。其活动中心是上海并在绍兴、广州、南京相继成立南社的分社，分别称作越社、广南社和淮南社。武昌起义后，又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南京等地设通讯联络部门，大力创办报纸、出版刊物，鼓吹革命，拥护共和，声势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五四运动后，南社出现分化，部分社员加入新文学运动，柳亚子于是改组南社，于1923年在上海成立“新南社”鼓吹新文化运动。1924年，傅熊湘在湖南组织“南社湘集”反对新文化而力保国学传统。南社社员的鲁迅曾经对此批评过。南社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和文学史都产生过双重影响。柳亚子、叶楚傖、邵力子、胡朴安、陈望道、曹聚仁、鲁迅、茅盾、廖仲恺、何香凝、蔡元培、谢无量、章乃器、钱昌照、曾虚白、赵景琛、刘海粟、黄苗子、郑逸梅等大批著名人士都与南社有很深的关系。

陈去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主革命的先驱者。

陈去病故居座落在古镇三元街。故居正门楣额上有原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时任中国南社名誉会长周南的题词“孝友旧业”。故居内主要建筑有百尺楼、绿玉青瑶之馆、家庙及书房、浩歌堂等。一代名人已逝，但走进这座古朴、庄重、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位叱咤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的身影，感受到他忧国忧民，进行反清革命的足迹。

陈去病(1874—1933)，初名庆林，字佩忍、巢南，别字病倩，号垂虹亭长。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与柳亚子等先创南社，继而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孙中山北伐大本营宣传主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参议院秘书长等职。孙中山先生亲切地誉他为“十年袍泽，患难同尝”。

1903年初，30岁的陈去病告别了中国教育会的同仁，只身赴日考察。在日本时，他很想谒见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但不久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去了东南亚，失之交臂。在日期间，陈去病结识了黄兴等革命党人，为日后孙中山在上海召见他作了充分准备。为了表达推翻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统治者的决心，陈去病将母亲赐给他的陈庆林原名改为陈去病，表示要以西汉名将霍去病为榜样，担当天下兴亡之重任。1913年3月，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在严重的挫折面前，陈去病追随革命领袖孙中山，同北洋军阀作不屈的斗争。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发动护法运动，陈去病在浙东起义响应，赴粤护法。同年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决定成立军政府，陈去病任非常国会秘书长。1922年，陈去病

随孙中山在韶关行幕大本营，任前敌宣传主任。孙中山逝世后，对陈去病打击很大，原有的政治热情随着孙中山逝世而失去。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表示不满，拒绝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从而转入学术研究。1931年后，曾任上海持志大学教授，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等职。1932年，陈去病尽辞诸职，“告老回乡”，把同里部分旧宅翻建作书馆和卧室，题名为“绿玉青瑶之馆”，编订了《孙总理家世表》、《癸丑革命史料》等著，“绿玉青瑶之馆”现位于故居南侧，与之相邻的为二楼一底的“百尺楼”，这是陈去病的旧书房，他所编著的《百尺楼丛书》，即以此楼而名之。陈去病不仅一腔热血追随革命，而且还是一位近代著名诗人。1933年10月，陈去病逝世于同里，国民政府明令致哀，以生平事实录入国史。

任鸿隽，字叔永，四川巴县人。440（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归安，出生四川垫江。1904年中秀才。1907年进入上海中国公学。1909年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09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曾为孙中山草拟《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院文》、《祭明陵文》等。

杨铨，字杏佛，一字死灰，江西清江人。。229

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441

中国科学社（1915年—1960年），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由一群中国留学生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任鸿隽为首任社长。中国科学社1918年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现名南京大学）。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中国科学社以后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作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最多的科学团体，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系统和奠基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1922年，秉志、胡先骕、钱崇澍、杨杏佛等人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首开中国现代生物研究的先河，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纯科学研究机构。以后又在北京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

1928年，以中国科学社成员为主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并陆续创办了各研究所。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相继成立，中国科学社的刊物、设备等各项社产陆续并入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上海科普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国家与地方机构。

许肇南：中国水电工程先驱

许肇南，字先甲，贵州贵阳人。539

据柳亚子所编《南社社友姓氏录》载：“许肇南，字先甲，贵州贵阳人。入社书号为 539。”许氏是贵州较早加入同盟会的进步人士，也是贵州第一个赴美国留学的学生。

1886 年 12 月 12 日，许肇南生于贵阳。他四岁丧父，后随母入川，初习旧学，后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并加入同盟会。1905 年，19 岁的许肇南被选为东渡日本的留学生。他热衷自然科学，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去到日本。1908 年又转赴美国学习，先后在伊利诺斯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攻读电机工程，获学士学位及电气工程师职称，并兼习工业经济和经营管理。

许肇南在美国保持着较高的社会活动热情，经常参与学生活动，被留学生推选为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曾与杨铨、任鸿隽、胡明复等发起康奈尔大学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成为团结留学人员，宣传革命思想，研讨科学技术的组织者。许肇南最后毕业于哈佛大学。

任鸿隽 1914 年在美国与赵元任、胡明复等联合发起成立科学社，并集资创办《科学》月刊。1915 年 10 月 25 日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和中国科学社社长。《科学》月刊也于同年问世。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两年，他还担任了《留美学生季报》主编，撰写了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1918 年秋回国后，悉心发展中国科学社事业，任鸿隽知识渊博，文才出众，一生撰写论文、专著、译著、诗稿和科普作品 300 多篇（部），内容相当广泛，涉及科学、教育、管理、政论等诸多方面。他还是清末文学团体“南社”的社员，著有《古青纪游诗》1 册。

胡先骕（1894~1968）号步曾，江西新建人，植物分类学家，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

毕生从事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是继钟观光后的又一位大规模植物标本采集者。一生发表植物学论文 140 余篇，发现一个新科 6 个新属和一百几十个新种。1946 年底收到郑万钧寄来的薛纪如从四川万县磨刀溪采到的水杉枝、叶、花、果标本，进行研究并确定，它与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在 1941 年发表的两种植物化石同为一属植物。1948 年 4 月与郑万钧共同发表给以新的种名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这一发现使世界植物学界为之震惊。1954 年他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该书内容翔实，在植物分类原理一章中，驳斥了苏联李森科关于物种的见解。

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正大学校长。

1913年 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先学农艺，后改学植物学。
1915年 加入中国科学社，开始在《科学》发表论文。在《留美学生季报》、《南社丛刻》发表诗词。

1919年 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等所倡导的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提出批评。当选中国科学社书记。

1928年 参与创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任植物部主任。1960年 请钱钟书代为编订平生诗作《忏庵诗稿》。

1961年 作《水杉歌》长韵。

杨杏佛

杨杏佛（1893-1933年6月18日），又名杨铨，字杏佛，江西省樟树市大桥乡（现更名为大桥街道办事处）杭溪村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与茅以升一道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即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当时校址在河北唐山)。武昌起义爆发，赴武昌参加保卫战。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到南京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孙中山辞职后，他赴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学习。毕业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留学期间发起创办《科学》杂志。杨杏佛是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极力追求和力行实践者，曾任孙中山秘书，备受孙及国民党左派所赏识。欲行独裁的蒋介石视其为眼中钉，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为人权和民主奋力奔走呼吁，终令蒋杀机顿起，决定用暗箭铲除异己。关于他的死因，长期以来似已成为定论：“杀杨儆宋”，即杀杨杏佛是为了警告宋庆龄。真是如此么？

杨杏佛，江西清江人。早年就读上海中国公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同年春参加南社。南北议和后，因不愿在袁世凯政府任职，11月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1918年毕业回国，获商学博士学位。1920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1922年与赵元任等创立中国科学社。1924年赴广州任孙中山秘书，深得信任与赏识。1925年3月任孙中山治丧筹备处总干事。1928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12月，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兼执委。就在他在自由与民主道路上纵马驰骋、大展身手之时，1933年夏日的一个清晨，几声枪响，结束了这位民权斗士的可贵生命。

1918年回国，1920年任东南大学教授。经常与共产党人恽代英接触，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课。因而遭校方忌恨，被迫离校，奔赴广州，投向革命。到广州后，任孙中山秘书。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1926年1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秘密成立，杨杏佛被选为执行委员，主持策应北伐军工作。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杨杏佛出席国共联席会议。起义胜利后，当选为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认清蒋介石面目，以中国济难会名义极力接济和营救革命者，被国民党当局撤职。“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对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和监禁爱国人士，与宋庆龄、蔡元培等著名人士于1932年12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并组织营救了不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驾车外出，被设伏特务枪杀于上海亚尔培路。杨杏佛死后，鲁迅以悲愤心情吟下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时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南社研究论文索引

(1994--2001)

金建陵 张末梅检索、编辑

- 《南社》，杨天石，刘彦成，中华书局，1980，10
《南社史长编》，杨天石，北京中国人大出版社，1995，5 南社丛书·第一套
《南社人物吟评》，邵迎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4
《南社丛谈》，郑逸梅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5
《柳亚子文集·南社纪略》，柳亚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南社丛刻》，江苏广陵出版社影印本，1996
《南社诗集》，柳亚子编，上海开华书局 1936
《南社词集》，柳亚子编，上海开华书局 1936
《南社从选》胡朴安，上海国学社 1936，6，沈锡麟，毕素娟校注，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7，（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南社诗话两种》曼昭，胡朴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南社小说集》，王均卿编，上海文明书局 1915 年
《新南社社刊》柳亚子等编，1924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南社启》高旭，《民吁报》1909，10，17
《南社例十八条》，《民吁报》1909，10，27
《南社诗文词选叙》陈去病，《民吁报》，1909，10，28
《南社诗序》，宁太一，《民吁报》1909，10，29
《南社雅集小启》，陈去病，《民吁报》1909，11，26
《南社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徐蔚南，《南社诗集》第1集

《苏曼殊研究》柳无忌编，上海人民 1987，12
《苏曼殊评传》，李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9
《民国奇才奇文·苏曼殊卷·天涯红泪》，丘桑主编，东方出版社，1998 年 6 月第 1

版

《苏曼殊诗文选注》曾德珪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

《苏曼殊新论》，邵迎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

《苏曼殊诗笺注》，刘斯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燕子龕诗笺注》，马以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苏曼殊研究》柳亚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情僧长恨--苏曼殊》，宋益乔，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8

《苏曼殊全集》，柳亚子、柳无忌编，上海北新书局，1928，12

《苏曼殊评传》英文本，柳无忌，美国纽约特纳公司 1972年初版。

《苏曼殊散论》，朱少璋，香港下风堂文化事业，1994，12

《郁曼陀陈碧岑诗抄》郁曼陀、陈碧岑，郁风编，学林出版社，1983年3月初版

《南社张素诗文辑存》，张素著，金建陵，张末梅笺注，江苏省南社研究会，

2000，7

《南社三刘遗集》，刘今希，刘约真，刘鹏年，中华印刷厂，1993，5

《黄侃学术研究》，郑远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5

《于右任传》，许有成，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5

《陈其美传》莫永明，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5，1

《我的父亲林白水》，林慰君，时事出版社，1989，3

《马君武诗注》，潭行等，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7

《陈去病评传》杨天石，《中国历代著名文学评传·续编 3》

《黄人集》黄人著，江庆柏，曹柏根整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8

《江左十年目睹记》，姚鹓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12

《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沈卫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4

《黄叶楼遗稿》刘三著，陆繁霜原辑，黄太玄原勘订，刘颖白校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

《姚光集》姚光[著]；姚昆群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

《高燮集》高燮著，高钰，高铎，谷文娟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徐蕴华，林寒碧著；周永珍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丽白楼遗集》林庚白著；周永珍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册(1270页).

《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244页.

《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第二十四集未刊稿》柳亚子编；马以君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1994.

《吴江沈氏长次二公剩稿》沈眉若、沈颖若著，沈有美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2

《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程千帆、唐文编，三联书店 1985

《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汪辟疆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南社研究》第1辑至第6辑，马以君主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994.

《南社研究》第7辑，马以君主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10

《南讯》第1期至第15期，江苏省南社研究会，1995--2001

《南学通讯》第1期至第17期，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秘书处，1991-2000

《国际南社学会丛刊》，国际南社学会秘书处。

国内南社研究概况 ---柳光辽

——致阿胜（蔡恒胜）

1987年在苏州举办了柳亚子诞生100周年和南社发起8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学术交流会议上，与会学者提出了成立南社研究学术团体的动议。之后，国际南社学会（柳无忌牵头，办事机构设在香港）、中国南社和柳亚子研究会（会址在北京，挂靠社科院近代史所，尹瘦石任会长）相继成立，广东、云南、江苏等地纷纷成立南社研究会，上海成立了南社研究中心。这些团体印行内部刊物，组织学术活动，南社研究渐成气候。20多年来，大致有以下一些成果：其一，抢救、出版南社史料，为研究者查找资料提供方便。比较突出的有，柳无忌主持和资助的三套《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和扬州广陵影印的22集《南社丛刻》。在《南社丛书》中，杨天石的《南社史长编》和殷安如主编的《南社人物传》，资料比较丰富，可当工具书用。其二，开辟交流园地。除各学术团体的内部刊物外，《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设南社研究专栏，至今已15个年头，中国南社和柳亚子研究会，设有南社研究的专题网站，网址是：

<http://nanshewan.b121.53dns.com/indexb.html>。其三，研究队伍逐渐形成，队伍的结构有很大变化。以南社为选题的高校研究生在增加，南社研究的基干正由南社后裔向高校师生转移。后裔的优势在于占有某些独门史料，但要在文学和史学方面作深入的理性分析，显得功力不足；况且，年轻一代的南社后裔，对这些“老古董”多半看不懂，更缺乏兴趣，而高校却是常青树，南社研究在高校扎根，是其具有深入持久发展的生命力的必要条件。目前南社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缺乏能起牵头和推动作用的核心，来组织起群体力量。柳无忌在世时，以他的身份、学养、财力，为南社研究打下了不错的基础。他去世后，国际南社学会沉寂了。广东的南社研究会，因后继无人，基本解体。北京的和江苏的，虽然完成了换届，但新班子还没有把台面撑起来。只有云南南社研究会一直很活跃，但它是一个和诗词协会同体的组织，主要兴趣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上海的南社研究中心，由姚石子的儿子姚昆田主事，挂靠在上海文史馆，很有活力，大有想当领头羊的味道，但似乎还没有组织起稳定的学术队伍。南社研究者都期望以今年的100周年活动为契机，能重整旗鼓。关键是要有能出钱肯出力的人（其实也不一定要很多人，只要有几个得力的），像当年陈去病不辞辛劳地四处联络，柳亚子埋头苦干一期一期的编印《南社丛刻》。幸好，大家对100周年活动的期许，或许能形成一些合力。

今年的纪念活动，还处在酝酿阶段，中国的特点，每年二、三月份开各级的人大和政协会议，正是提提案，要求举办纪念活动的时机。苏州和吴江积极性比较高，已逐步进入实质性准备，例如苏州在整修张公祠，吴江在编《南社百贤》等。

我估计会有这样一些活动：纪念会。弄出什么样的规格，在北京开“中央级”的，或者在江苏开“地方级”的，看北京方面有关人士的功力了；学术交流，南社研究者聚会。估计会在江苏，目前苏州和吴江都在争取举办权，有可能一家一半；举办一些展览。如史料展、书画展等等；出版一批书籍和论文。据我了解，目前已出版的有《葫芦吟草》、《柳亚子史料札记》、《南社戏剧志》等，已定下出版合同正在印行中的有《张素诗文集》、《分湖诗抄》（柳亚子编）、《陈去病诗文集》（国际南社学会版）等。到年中，具体计划大约能有个眉目。

南社一向被定位成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社员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风云中和民国政府里都起过重要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不乏他们的身影，所以，南社研究最初的切入点自然是南社人物和诗词的革命性。随着史料积累愈来愈丰富，特别是南社研究进入高校后，研究内容趋向多视角、多层次，从一百多年来民族复兴大业和文化变迁的大背景去理解和分析南社，很有研究余地。大致来讲，南社研究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对南社本身，史料的梳理和是非功过的点评。代表作有杨天石的《南社史长编》和孙之梅的《南社研究》。一是南社文化，评点南社与社会和文化转型间的互动。南社在提倡革命文学、倡导戏剧改革、发展通俗小说以及新闻、教育建设等做出了多方面的建树，可以说，南社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如曾景忠从中西文化撞击论述南社诞生的背景，卢文芸的《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等。一是南社人。南社的主干是中国农耕社会的士绅阶层，他们经历了从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他们的心路历程折射了社会的变迁，不少社员更是现代社会中一些新行业的先驱者。南社出于中国政治体制转型时期，对正处于当今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的国人，南社人是很有意义的历史镜鉴。从南社研究人员来看，近年来比较活跃的，有山东的孙之梅（女博士，以南社研究为学术方向，指导了不少硕士研究生），湖北的卢文芸（女博士，南社网站的创办者），南京的金建陵、张末梅夫妇（南社社员张素的孙女婿、孙女，有独特的研究方向和思路，占有大量网上的南社研究资料）等。专题研究者，如吴江张明观，研究柳亚子，已出版《柳亚子传》、《柳亚子史料札记》，整理了柳亚子编的《分湖诗抄》，正在收集柳亚子轶文轶诗和南社社员图鉴。如吴江文联主席俞前，曾和殷安如一起编写《陈去病年谱》，正在写《陈去病诗传》。等等。老一辈的南社研究者有杨天石（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国文史馆馆员）、郭长海（长春师范大学退休教授，长期钻研图书馆，占有丰富的南社成员史料）、姚昆田（南社后期主任姚石子的儿子，上海南社研究中心的主持人）等也还很活跃。另外还有一批近代史、近代文学研究者和地方志的编辑者也都关心南社研究，中国南社和柳亚子研究会就是由近代文学所的张炯、王飙主持。

我之涉足南社研究，十分偶然，可以说被人“忽悠”而失足落水，结果是上虎容易下虎难。自幼学理工，文史的功底浅，所以心有余而力不足，深入不进去，写不出有学术水平的东西，只能发点感言之类的，惭愧惭愧。介绍以上皮毛，供参考。

陈绵祥，字亨利，字馨丽，号希虑，江苏吴江人。去病女。1100

《跳踉一首寄馨丽湄潭》：

群纪交情廿五春，
难忘辫发跳踉辰；
雨花台下驱车共，
明圣湖头仗酒频。
中岁依人还落魄，
能狂名父愧传薪；
思量汤饼筵前见，
四十生儿湄水潺。

《南社和中国科学社》一文读后很受启发。过去比较强调的是南社宣传民主革命的事迹，，其实南社对传播科学精神也是采取积极态度的。它为“五四运动”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起过披荆斩棘的拓基工作。过去常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下，南社落后了，消沉了，最后解体了；其实南社也为五四时代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准备。长江后浪推前浪固然不错，但前浪对后浪的导引却也是事实。下面一些史料，供你参考：

——马君武《与高天梅书》：“得来书，喜欢竟日。别后来德意志，从事农学，逾一年矣。独居雷登田庄，所学与日俱进，差足慰告故人。世界战争，备极凶残，强者生存。世界公理，图强之真原因为智识进步，科学发明，而新文化之输入，实吾国图存之最先着。共和国老辈，终不能与此潮流相敌也。……极望君勿作悲观，稍节饮酒，祖国前途辽远，吾侪不可抱自杀政策也。”——转摘自《南社史长编》387页

——周祥骏《与姚凤石书》：“窃谓韩、欧、苏、王，皆颇有因文见道处。况今百喙争鸣，人各持一说，吾辈生当近世，作为文词，若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之恒态，则亦恶睹所谓文学更新者哉？虫吟草间，于国事既无补，于吾道究何益？

弟前在沪上，曾与剑华言及，颇不愿听。亚卢似愿听矣，而又无暇道其详，即匆匆别去。吾兄文情绝世，年方廿余，倘能研究学术，参稽宗教，融贯于心，乃矢诸口，五、七年后，吐辞为经，似可操左卷。

但文章一道，不宜谈理。语录填塞，殊嫌腐气。然胸无真理，亦只能作空头文字而已！一切后进，皆不愿观。科学大明，恐终当劣败。其不败者，必其中含真理者也。化合诸派，荟萃古今，方能臻此妙境。空言无补，未足方斯，吾兄以为然否？”——转摘自《南社史长编》186页

——周祥骏《答〈国粹学报〉胡仲明书》：“窃惟运丁阳九，沦亡是惧，欲救以学，则必揩拭双眸，盱衡六合，甄采老、墨，吸纳佛、耶，驱策化、电、声、光，观摩倍、笛、达、赫，然后提挈儒术，互相衡量，醇疵毕见，始萃一炉，

鼓铸既烈，精光四溢。斯国粹署名，乃其实克副。若摭拾琐碎，钩稽异同，株守片隅，重研哲理，纵缘新法比附，究属变相汉学，趣注末节，无俾本体，横流日甚，亦终必亡。政教礼俗，安能皮傅耶？”——转录自《南社史长编》186页

周祥骏的几封信写在南社成立前后，是南社社员中最早提出系统学习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思想很前卫。他自己年纪大了，所以寄希望于年轻的社员。马君武学成归来后，在办高等教育方面很有建树，曾有“北蔡南马”之说。你熟悉互联网，搜索“马君武”，或许能有收获。

柳光辽

《激扬文字》毛泽东与柳亚子的三次握手

【2/12/2008 9:57:44 AM】 来源:文汇报书周报



《激扬文字: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作者:史一帆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收集了大量与毛泽东诗词有关的背景材料,所选的背景故事,包括毛泽东诗词创作和发表的两大时空,内容丰富,并有作者比较中肯的评述,对读者理解毛泽东诗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中国是一个诗人如云的国度,历朝历代,诗人无数,但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在全世界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文学团体“南社”社长。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被蒋介石通缉,逃往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解放战争时期,避居香港,继续从事民主斗争。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次握手”

1949年2月，全国解放在望，柳亚子和许多民主人士一起，应毛泽东的邀请，离开香港，转赴北平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3月下旬抵达北平。行前，他在诗中写道：“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

3月25日，毛泽东从西柏坡抵达北平，柳亚子亲赴西苑机场迎接。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柳亚子等。柳亚子万分高兴，即席赋诗三首。其中还有一首这样的诗：

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毛泽东一生中，与柳亚子有过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聚会，也就是柳亚子诗中提到的“二十三年三握手”。第一次是1926年5月在广州，第二次是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第三次是1949年在北京。

也许是柳亚子的“二十三年三握手”的诗句启迪了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和诗也从叙旧写起。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这两句写的就是毛泽东和柳亚子在历史上的两次交往：在广州饮茶畅谈的情景，至今未能忘怀；在重庆你向我索取诗句之时，正是黄叶的秋天景色。

1926年，柳亚子作为国民党的左派人士，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密切配合宋庆龄、何香凝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这一年5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同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毛泽东初次会晤。这次见面，毛泽东给柳亚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柳亚子在《寄毛主席延安》一诗中的“粤海难忘共品茶”及1949年一诗中写下的“珠江粤海惊初见”，正是表达了柳亚子初见毛泽东的心情。

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柳亚子以其诗人的睿智，坚信中国革命必将赢得胜利。他在《存殁口号》一文中写到：“……湘南赤帜正纵横。……并世支那两列宁。”并自注“两列宁”就是指“孙中山、毛润之”。足见他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坚信不移。

1944年5月，柳亚子还在桂林时，就与中共领导人有联系。9月，他由桂林飞往重庆，与中共领导人接触更为频繁，感受至深。他在1945年1月的《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宣称，“世界的光照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撰《延安一首》寄给毛泽东：“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他把中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身上。

毛泽东柳亚子第二次握手是在 1945 年。毛泽东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的“索句渝州叶正黄”，写的就是毛泽东和柳亚子的第二次会晤。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为了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毅然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谈判。柳亚子非常敬佩毛泽东不畏艰险、大智大勇的气魄，于 8 月 30 日写了《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一诗，内有“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之句。9 月 28 日，毛泽东邀请柳亚子在红岩办事处会面，促膝谈心。毛泽东纵论国内形势，说明不要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柳亚子深受感动，并赋诗二首，内有“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与君一度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蔡清富，黄辉映：《毛泽东诗词大观》，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版，第 246 页。）等句。

毛泽东在离开重庆回延安的前夕，应柳亚子索句，将 1936 年所作的《沁园春·雪》一词书赠。柳亚子得此，惊喜莫名，乃撰词和之。

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在艺术上做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不但是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不能比拟，清代的纳兰容若也望尘莫及，他为此这样赞颂毛泽东的诗才：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

犹输气概，

稼轩居士，

只解牢骚。

更笑胡儿，

纳兰容若，

艳想浓情着意雕。（钟辰、夏鹭、叶兰：《领袖交往实录系列·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柳亚子还从国民党民主派的立场出发，认识到只要中国各党各派、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推翻反动统治。因此，他在和词的结尾，用“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来抒发他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并肩战斗，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信念。柳亚子的和词和毛泽东的原词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等报刊上发表后，立刻轰动山城，和作如云，各报竞刊，流誉全国。至于毛泽东给柳亚子书赠词作，还有一段小插曲：柳亚子见毛泽东赠给他的《沁园春·雪》词上没有印章，就请毛泽东

盖个章。毛泽东说：“没有。”柳亚子即慨然许诺：“我送你两枚吧。”但柳亚子又不会篆刻，便请篆刻家曹立庵连夜为毛泽东刻了两枚。第二天，柳亚子将印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便在题写在柳亚子纪念册上的《沁园春·雪》一词上盖了章。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和柳亚子多次一起讨论时局，这使柳亚子受益匪浅。当时柳亚子对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重庆谈判的前途有些不适当的估计。对此，毛泽东给他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10月2日，毛泽东约柳亚子晤谈于郊外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4日，又致信柳亚子慰问柳夫人的病，同时对柳亚子的诗予以评价。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十月四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261页。）

柳亚子收到信后，感奋不已，于10月6日“以诗代柬”，“呈赋二首”呈毛泽东。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使柳亚子看清了时局发展的方向。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毛泽东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柳亚子先生的关怀及柳亚子对毛泽东的崇敬，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党外朋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友情。

1945年底，柳亚子由重庆飞返上海，立即投身民主运动。但由于国共关系的恶化，国民党当局不断加紧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柳亚子被迫于1947年10月离沪去香港，积极参加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的工作。

毛泽东与柳亚子的第三次握手就是在1949年3月25日，柳亚子到西苑机场亲迎从西柏坡抵京的毛泽东之时，这次握手以后，他们两人的情谊更加深厚。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也就是在这期间对柳亚子1949年3月28日作的那首《感事呈毛主席》一诗的酬和。毛泽东的这首和诗作于1949年4月29日，两天以后，即1949年5月1日，他们俩又共游了颐和园。此后，毛泽东为了便于与柳亚子交往，又将他的住处转迁北长街，并为他配置了专用轿车。这一切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柳亚子。

毛泽东与柳亚子同游颐和园

1949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两天前刚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的毛泽东，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到颐和园新居看望柳亚子。

柳亚子把毛泽东接到他住的屋子里。两位诗人坐在一起喝茶抽烟，谈笑风生。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便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

毛泽东和柳亚子经过了戏院的大院，来到谐趣园游览观景，然后爬坡到了益寿堂的大院里。

在益寿堂里休息喝茶交谈一阵子后，毛泽东便对柳亚子说：“咱们今天都很高兴，走，游园去。”

柳亚子也很有兴致：“好，游园去。”

毛泽东和柳亚子走出益寿堂，直接来到了长廊。

柳亚子说：“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可耻。”

毛泽东说：“她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这也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她们挥霍了要好呀。”

不多时，他们又来到了慈禧太后买的那个小火轮跟前。毛泽东和柳亚子对这个小火轮都很感兴趣，他们站在一边，仔细地看。

柳亚子说，那时，中国相当落后，慈禧太后能买到这个火轮，能看到这样的火轮，也算大开眼界了。

毛泽东说，事物总是要发展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中国再也不能继续落后下去了，等全国胜利以后，我们要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一定要改变落后的面貌。

参观了小火轮，参观了石舫以后，一行人就上了游船，开始游览昆明湖。

船快到湖心的时候，毛泽东和柳亚子又亲切地交谈起来。

柳亚子说，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我们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做了一点微薄的工作，也吃了不少的苦头。我们都很清楚，蒋介石早晚是要

垮台的。因为他们腐败无能，太不得人心了。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所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比如用一百万军队带上轻武器，完全武装泅渡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渡江工具。我们没有兵舰、轮船，就要靠人民用土办法造木船、木排划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我们有很多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三十万军队。这一下子，蒋介石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梦想破灭了。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像这样一个普通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帝国主义的援助。总的来说，我们的军队比蒋介石的军队准备得好，除了飞机、军舰以外，我们什么都比他们多。

毛泽东还说，现在，杭州解放了，上海很快也解放，你们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么快。今天咱们可以这么说，如果蒋介石有一点头脑，实行在重庆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蒋介石现在还是咱们的委员长。共产党是尊重协议的，愿意进行国共合作，愿意实行和平建国的方针。蒋介石要打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愿望没能实现，只好和他打。蒋介石和李宗仁政府，现在已经相当被动了。他们除了接受和平解决的八项条件，别的没有出路。我们愿意按照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同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进行谈判，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先生可以根据这种精神去进行宣传。

毛泽东又开玩笑地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

柳亚子高兴地说：“我一定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我要尽力做一些对人民、对政府有利的工作。”

游船绕过湖心岛龙王庙，通过精美而别致的十七孔桥。这时，看见湖东岸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不用说，他们是在看毛泽东的。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人员建议游船从十七孔桥的东南角靠岸，从南便门让毛泽东上汽车回去。可是，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建议。

毛泽东说：“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不要怕群众嘛。”

这样，游船只好往东岸靠近了。

毛泽东还没有上岸，岸上的群众就高呼：“毛主席万岁！”

有很多人冲着毛泽东使劲地鼓掌。

毛泽东上了岸，人们一下子就把毛泽东围了起来。有的还想和毛泽东握手。一看这种情况，毛泽东很关心柳亚子，他照顾着柳亚子，和他肩并肩地一起走。

来到大门口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更多，人都挤满了，简直没办法往前走了。这时，来了不少解放军官兵，帮助维持秩序，他们劝说着那些特别热情的群众，并组成了人墙。这样，毛泽东和柳亚子，才走出了大门。

在大门外，柳亚子对毛泽东说：“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多的群众对于领导人这种热情的精神。”

毛泽东握别柳亚子时说：“好了，有机会愿意再和你一块游乐。”

毛泽东在临上车之前，同站在他身边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握了手，并且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坐入车内，回香山双清别墅。

在返回香山途中，毛泽东对警卫人员说：

“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游园。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警卫员说：“主席很高兴，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心出事。”

毛泽东说：“你们不必担心，今天这么多人，也没有一个坏人。坏人是有的，但是坏人也不敢带上武器，整天在大街上和公园里去找毛泽东。”

在回香山的途中，毛泽东一直很高兴，仿佛还沉醉在畅游湖光山色的乐趣中。

而柳亚子也一样，畅游了湖光山色以后的柳亚子，兴致一直很高，事后，他还追记了一首诗，诗中就有“名园真许长期借，金粉楼台胜渡江”的诗句……